

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问题

综述汇编

迟秋明 薛国利 编

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问题 综述汇编

迟秋明 薛国利

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目 录

- 建国以来先秦诸子散文研究情况综述……江庆柏（1）
屈原及其作品研究综述……董洪利（14）
建国以来宋玉及其作品研究综述……陈剩勇（21）
近年汉赋研究综述……朱一清（30）
《文赋》研究综述……李庆甲（42）
近年来《文心雕龙》研究鸟瞰……王镇远（53）
中日学者《文心雕龙》学术讨论会综述……李庆甲等（60）
陶渊明田园诗问题讨论综述……曾远闻（69）
李白研究……王运熙等（76）
李商隐的无题诗和锦瑟诗讨论综述……陈冠明（87）
关于唐朝边塞诗评价问题讨论综述……邹广（96）
唐代散文研究……孙昌武（104）
一九八四年唐代文学理论研究综述……罗宗强（111）
宋词研究概述（1949—1982）……施议对（119）
关于宋诗评价问题的讨论综述……刘乃昌（128）
建国以来黄庭坚研究情况综述……凌左义（137）
《三国演义》研究中若干问题讨论综述……沈伯俊等（147）
八十年来对《水浒》作者的争议……黄徽成（156）
关于《水浒》主题的五种不同观点……马成生（166）
孙悟空形象原型研究综述……朱迎平（173）

- 近几年的《西游记》研究综述………刘耿大（180）
《长生殿》主题思想讨论综述………唐碧（211）
纪念吴敬梓学术讨论会综述………李灵年（220）
英美对《红楼梦》的研究………姜其煌（233）
近年来近代文学研究概述………闻竹（244）

建国以来先秦诸子散文研究情况综述

江 庆 柏

建国以来，特别是近几年，我国古典文学研究界对先秦诸子散文的文学成就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本文试从（一）总论（二）作家作品研究（三）对后代的影响等三个方面综述如下。

一 总论部分

关于诸子散文繁荣的原因，比较一致的看法是认为这首先跟社会的大变动分不开。社会的变化引起学术下移，统治者出于自己各自利益的需要大量网罗人才，养士之风盛行，形成处士横议、百家争鸣的局面，从而催生了诸子散文。徐北文《先秦文学史》（齐鲁书社1981年）指出：“只有到了这时，才出现了从文学史的角度上可以作为研究对象的散文作品”。“先秦散文是依学术的发展而发展的。”

研究者们肯定了诸子散文的文学性，但对文学性的主要标志看法并不一致。胡念贻在《文学史编写中的散文问题》（《文学评论丛刊》第三辑）提出了“有形象”、“突出地强烈地表现了作者的某种感情”、“在艺术结构和语言修辞等方面很见工力”等三个标准，并认为“第一个标准是主要的。”李泽厚《美的历程·先秦理性精神》认为诸子散文“所以成为文学范本，却大抵并不在其形象性，相反，是他们说理论证的风格气势”，“情感性比形象性更是使它们具有审美艺术特征之所在。”

有的文章试图从总体上来把握先秦诸子散文的基本特征并进而探讨诸子散文发生、发展的艺术规律。张志岳在《文学上的庄子》（《社会科学战线》80.3）中认为，“就诸子散文而论，有两个共同特点：第一是关于社会上的许多问题，特别是政治问题，都纷纷提出自己的看法和主张，形成一套一套的不同理论。第二是诸子在阐发他们的主张也就是论点的时候，都用了大量的故事、寓言和多种多样的比喻来进行说明。”就这后一点，张志岳在《试论我国古代重要文学样式的发生发展及其衰替与文学语言发展变化的关系》（《齐齐哈尔师范学院学报》81.1—2合刊）一文中说：“先秦散文用这种方式实在太多，多到喧宾夺主的地步。这就不仅是文字上不经济，而且也必然影响到文章组织的严密性。”

张志岳在《关于中国封建时代的讽谕文学和叛逆文学两个传统问题的初步探讨》（《北方论丛》81.1）中认为中国文学存在着如题所说的两个传统，“孟子和庄子分别是这两种文学传统的奠基人。”郭预衡《战国文章的两大特征》（《社会科学战线》81.3）认为战国文章（实际主要是诸子散文）的基本特征一是“放言无惮，为后人所不敢言”，二是“深于比兴，深于取象”。

张碧波等《先秦散文论略》（《社会科学战线》82.2）认为“先秦散文有两个不同的历史渊源：一个是从象征诗到卜筮典籍再到纯哲学散文的发展；另一个是从实用的记事文体到诰书再到仅对社会生活进行概括和解释的半哲学性质散文的发展。”其第一个里程碑分别是《易经》和《尚书》。《论语》《墨子》发展了《尚书》的传统，《老子》则“是对《易经》思想的直接继承”并由此“形成了它独特的叙述

方式和表达方法。这不但体现在《老子》用韵体和半诗半文的形式构成，不但体现在它残留有诗的比兴手法……同时也体现在它没有运用自《论语》《墨子》发展而来的判断、推理方法，而是采用抽象叙述的方法”。文章认为《庄子》《孟子》是文学走向解放的第一步，分别继承发展了《老子》《论语》的传统。文章认为“荀子的赋（《蚕》等）、言理诗（《成相》）”和楚辞一样，“在中国多期文学解放的进程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因为“理性观念已依附于文学的形象描绘之中。因此，在类属上，它已经属于文学形态而不是宗教、哲学形态。”

还有一些专题性的讨论文章。吴庚振《古代论辩艺术初探》（《河北大学学报》82.3）说：“我国论辩体制的确立，是在战国时代。“荀子和墨子等人确立了立论的体制”，“孟子等人以其理论和实践确立了驳论的体制。”李博《杂谈先秦诸子散文引喻明理的手法》（《河南师大学报》82.1）、郑子瑜《论先秦诸子的修辞技巧》（《社会科学战线》80.4）、姚双安《谈〈孟子〉中的譬喻并及“譬”与“比”之异同》（《孝感师专学报》83.2）等文讨论了诸子散文的排比、譬喻、讽喻等语言现象。

二 作家作品研究

作家作品研究主要集中在《论语》、《孟子》、《庄子》、《荀子》四部书上，近年比较注重于艺术性的探讨。此外《晏子春秋》也引起了注意。

《论语》关于本书的思想内容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孔子思想中有消极落后的因素，但本书反映的仁、仁政等儒家政治思想的核心理论，还是有其进步性和历史意义的。

本书的艺术成就主要在于成功地刻画了孔子这个人物形象。胡念贻《从人物形象论〈论语〉的文学价值》（《先秦文学论集》）说：“这部书所写的人物，都以孔子为中心。在我国文学史上，以表现一个人物为中心的著作，这是第一次出现。”尹建章《〈论语〉文学性初探》（《郑州大学学报》82.3）分析其文学性为“通过对生活事件的记叙、描写，展现人物思想性格、揭示事物本质、说明道理”，“主要采用客观抒情的方式，即用人物自己的语言直接抒发各自的喜怒哀乐之情”。对其富于艺术性的语言也进行了分析。尹文同时指出《论语》和纯文学作品的区别，一是限于真人真事，“它不象其后的纯文学作品那样，对生活材料进行了艺术的加工，加以合理想象和虚构”，二是“人物思想性格没有发展演变的过程”。

《墨子》《墨子》由于缺乏文采，故从文学角度研究的很少。比较一致地肯定的是其论辩文的形式和严密的逻辑性，这对以后的文章有一定影响。谭家健《〈墨子〉在先秦散文史上的地位》（《中州学刊》83.4）着重探讨了该书在散文史上的承前启后作用。《墨子》开始“从语录体到专论体的过渡”，它的进步表现在“每篇都有鲜明的标题以概括中心思想”，“每一篇中各段语录之间有密切联系，而不是把同类型的话简单凑集”，“文章有头有尾，结构完整，层次分明，章法井然”。《墨子》开始有意识地在论说文中运用形式逻辑，用类比法展开驳论，用因果律（“明故”）证明立论，用“三表法”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些方法对《荀子》《韩非子》散文都有直接的影响。《墨子》并开始从简单对话发展到曲折完整的故事，《公输》篇已经是“有意刻画人物”。谭文还考证了《墨子》的成书年代，认为“《墨

子》成书当在孟子之后荀子之前”。

《老子》专门从文学角度研究《老子》的也不多。汤漳平《论〈老子〉在我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中州学刊》81.2）认为《老子》是一部哲理诗，“作者采用诗的形式，以简洁的文字，流畅而富于音乐感的语言，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思想。”“《老子》是战国时代我国中原文化和楚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文章还认为“《老子》最富于现实主义精神，最少宗教和迷信色彩。”陆永品《老子的散文》（《齐鲁学刊》82.2）也充分肯定了《老子》的艺术特色，“老子往往运用音乐的旋律，轻松的笔调，来阐释枯燥乏味、窈冥深邃的玄妙哲理”，用“鲜明的形象来阐发抽象的哲理，赋予虚无缥缈的自然道论以形象化具体化。”

《孟子》在先秦诸子中，《孟子》和《庄子》同是研究得最多的。关于本书作者，大家认为可能有孟子弟子参与，但主要是孟子自己。并且成书年代较早，可能是孟子生前便基本完成了的。全书风格也比较一致。

大家普遍认为《孟子》一书具有积极的进步倾向，特别是它的民本思想和民主性的精华。同时有同志也指出了哲学思想上的主观唯心主义。董治安等《孟子的仁政思想及其在中国古代文学上的影响》（《文史哲》78.6）认为孟子的仁政思想有其欺骗性的一面，但也“毕竟体现了新兴地主阶级对于自身力量的相信，对于封建制发展前途的满怀期望。”

关于本书的文学性，一般是从人物形象的塑造、语言技巧的运用、论辩艺术等几方面来加以研究的。

语言技巧主要是表现为明白晓畅、通俗易懂，同时巧于譬喻。关于人物形象的塑造，谭家健《略谈〈孟子〉散文的艺术特征》（《中国古典散文研究论文集》）认为孟子的性格

“基本上是当时先进知识分子的代表”，“孟子的豪爽直率、泼辣大胆的个性，在孟文中锋芒毕露、痛快淋漓的风格，都和这种思想有密切的联系。”孟文“只利用人物语言，通过孟子自己说的话”，“塑造了一个栩栩如生的抒情主人公的形象，这是‘孟子’散文的一个重要艺术特征。”

由于孟子在我国文学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气”这个概念，并把“养气”和“知言”结合起来，具体运用在他的对话和文章中，从而形成了具有鲜明个性的论辩技巧和论辩风格，因此近年来有许多专门的文章对此进行了探讨。张惠仁《孟子——我国古代辩对散文的开元者》（《四川师院学报》80.3）指出孟子的辩对散文是“以问对、答辩的方式展开文章，它的针对性较其他‘论’、‘说’体，要求更高，它以驳论为主要的或突出的论证方法。”“辩对散文，是一种反映人们逻辑思维成果的文体，它以证明、反证明、推理的逻辑方法，阐明基本观点。”辩对散文的产生有赖于逻辑学的发展，“孟子的‘知言’说出现后，不仅使先秦时代我国朴素的逻辑学体系从概念、判断到证明、反证明、推理臻于系统化，而且在我国的文章学与逻辑史上，第一次从理论上把文章学与逻辑学合为一体。”徐立《孟子论说文的特色》（《华南师范学报》80.3）则认为孟子文章“有纵横家的特点。他擅长纵横家的那套‘捭阖’、‘转丸’，‘揣情’、‘摩意之术。’其缺点是‘没有墨子、荀子那种‘隆正’、‘察类’、‘明故’的科学态度，而有时是一种‘无故’、‘乱类’的恣意推论。”他们根据孟子的特点把逻辑学与文学作品结合起来研究，这无疑是有意义的探索。但究竟怎样评价孟子的逻辑思想，意见尚有很大分歧。这需要作进一步的研究。

徐华龙《孟子对民间文艺的运用和认识》(《思想战线》82.5)探讨了孟子和民间艺术的关系，文章指出孟子大量运用劳动人民创造的丰富的民间文艺，有两个原因，“孟子有强烈的‘民’的观念，和“为了对话的需要”，这表明孟子“在自觉地肯定民歌的现实主义精神和其确有的科学价值。”事实上，在先秦其他诸子身上我们也可以看到相同的情形。因此探讨先秦诸子和民间文艺的关系，无疑也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课题，而这过去常被忽略。

《庄子》讨论《庄子》的文章最多，而分歧也最大。现择要概述如下。

《庄子》其书有三种看法。①内篇为庄子所作，有的同志还加上《寓言》与《天下》。其余则为庄子后学所作。②与上相反，外杂篇为庄子所作，内篇为后学所作。③全书基本上是庄子所作，陆永品《〈庄子〉若干问题简论》(《河北师院学报》83.2)说：“《庄子》篇章的真伪问题，在宋以前并无人提出。直到苏轼才……主张将以上四篇《盗跖》、《渔父》、《让王》、《说剑》)从《庄子》里删去。”据此文章认为“三十三篇《庄子》基本上是庄子所作。”

关于《庄子》的创作方法也基本上有三种看法：①现实主义，②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③浪漫主义，这又可分为两种：积极浪漫主义和消极浪漫主义。①罗根泽《论〈庄子〉的思想性》(《文学研究》57.1)认为庄子思想有虚无主义神秘主义倾向，但揭露和批判当时社会的黑暗与学术界的纷争，“使他的作品富有现实主义精神”。②严北溟《如何评价〈庄子〉的哲学思想》(《文汇报》1962.3.2)和《应对庄子重新评价》(《哲学研究》80.1)认为《庄子》具有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优点”，“就现实主义

言，尽管是一部高谈玄理的哲学书，而字里行间充满着葱笼的生活气息，有一种丰富的现实感和特别感染力。”③张志岳《文学上的庄子》（《社会科学战线》80.3）认为庄子对社会的批判“现实意义是很强烈的”，庄子作品的浪漫主义“基本上是符合高尔基提出的（积极浪漫主义）这个标准的。”对此，杨成福《关于文学上的庄子之评价问题——与张志岳先生商榷》（《山西大学学报》82.4）认为“尽管庄子对时政作出严峻的揭露和批判，却并不意味着他不代表奴隶主”，“庄子虚无主义的宇宙观、人生哲学和美学观等决定他采用的创作方法是消极浪漫主义。”陆永品《〈庄子〉与浪漫主义问题》（《破与立》79.1）认为，“庄子的散文，既没有反映出当时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的社会现实，也没有以进步的思想表现出鼓舞人们向往未来生活的理想。”“它的创作方法是消极浪漫主义的。”

关于庄子的政治态度，上述诸文多少已涉及到。不管庄子出于何种目的，他对现实批判揭露的深刻，这是众所公认的。苏祖斌在《试论〈庄子〉散文中的人民性》（《重庆师范学院学报》82.4）一文中肯定了庄子“大胆提出要求人身和精神的自由解放，要求征服自然，由人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的“进步意义”。文章还将庄子与卢梭相比较，指出“西方思想家在封建社会崩溃时用哲理语言表现出的平等、自由思想，《庄子》在中国封建社会开端就用形象思维的方法显示出来了，他们分别站在封建社会的两端，同样攻击着私有制社会违反人性的本质。”

本书的艺术成就被肯定得较充分，论题也集中，主要表现为气势雄伟，意境开阔，想象奇幻，语势宏大等方面。有的文章还专门研究了庄子的寓言。由于庄子的寓言既多又更具独

立性、表现性，有些同志就从研究寓言入手，进而研究庄子和“小说”的关系。

孙乃沅《庄子在中国小说史上的地位和贡献》（《江淮论坛》81.6）认为《庄子·外物》“辁才讽说之徒”“就是凭借口才讽诵小说——说故事的人”，“这里的‘说’不是‘学说’，‘道’，而是与‘诗’、‘文’并列的一类作品。称之为‘小说’，恰恰把它跟‘学说’的那个‘说’区别开来”。文章举《齐谐》、《穆天子传》等为例，说明当时已存在“小说”这一事物，“先秦两汉‘小说’一词都是指故事性的作品”。这样就使“中国小说的历史得以如实地提前了数百年”。

《荀子》研究者们认为诸子散文发展到荀子才基本定型。夏麟勋《试论荀子散文的风格》（《人文杂志》59.5）说，“先秦散文发展到荀子，结构严密，发展并奠定了散文的艺术形式”，到了荀子，“就可以不用问答体，不用述言体，而能很有条理地组成一篇结构比较严密的文辞”。夏文具体分析荀子文章指出，“荀子散文内容充实，论点突出，论证充分，组织严密，逻辑性强。同时语言生动，词汇丰富。既质朴又富丽，既儒雅又雄奇。”

还有文章专门研究了荀子的赋体文。包遵信《浅谈〈荀子·赋篇〉》（《文史哲》78.5）认为《汉书·艺文志》的“荀赋十篇”即“今本《荀子》中的《成相篇》三章、《赋篇》的礼知云蚕箴五赋、《诡诗》和‘遗春申君赋’。”支菊生《荀子〈成相〉与诗歌的“三三七言”》（《河北大学学报》83.3）探讨了诗和赋的关系。

《韩非子》至今用文学观念来研究本书的很少。张惠仁《韩非——我国古代“难”体散文之祖》（《四川师院学报》81.1）说，“韩非散文中有一类文章，是专门用驳难、

反证的方法来表现自己的思想体系的……即、‘难’体散文，它是韩非散文中最富有创造性、也是最富有个性特征的一部分。”文章从“‘治辩’说是‘难’体散文的理论基础”、“‘矛盾之说’是‘难’体散文的精髓”、“‘二难推理’是‘难’体散文的主要方法”等三个方面具体分析了韩非的这部分散文。朱俊芳《说〈韩非子〉寓言》比较了庄周和韩非的寓言，“庄周以恢诡谲怪的想象创造了众多奇幻瑰丽的寓言形象；韩非则以洞幽烛微的观察力，力透纸背的写实手法，对最普通的常识、最常见的人和事进行深入开掘。”

《晏子春秋》本书写作年代有两种看法，①秦以后，②战国。吴则虞《晏子春秋集释·序言》一文认为“约应当在秦政统一六国后的一段时间之内”。董治安在《说晏子春秋》（《山东大学学报》59.4）、《与吴则虞先生谈〈晏子春秋〉的时代》（《文史哲》62.2）等文中不同意这种看法，认为“编写者大约是稍晚于晏子的战国时人。”现在多数研究者都倾向于六国说。谭家健《〈晏子春秋〉简论——兼评〈晏子春秋集释·前言〉》（《北京师范大学学报》82.2）并根据语言风格，“《晏子春秋》平易朴素，与《国语》比较接近，没有战国后期那种铺张扬厉的风气。和《墨子》相比，语言风格也有相近之处”，进一步推断说“《晏子春秋》成书当在《国语》、《墨子》之后，《战国策》、《韩非子》、《吕氏春秋》之前。”

本书作者大家都认为不止一人，而且必定为齐人，吴则虞认为“极有可能那就是淳于越之类的齐人”。成书地点看法不一，吴则虞认为在秦国，杨天堂《〈晏子春秋〉的性质思想和艺术》（《暨南学报》82.1）认为在齐国。

关于本书性质体制，吴则虞认为“是一部古典短篇小说

集”。孙绿怡《〈晏子春秋〉的文学价值》（《东北师大学报》82.5）认为“从文体上看，是一部记叙人物生平轶事及各种传说、趣闻、笑话的故事汇编”，“它所提供的历史人物生平专辑的形式，对后来的传记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对晏子这个人物的评价问题，吴则虞说：“从历史发展方向来看，晏婴的政治思想是保守的，而不是进步的。”谭家健认为“这种说法似欠公允”，指出《晏子春秋》“反映了地主阶级内部一些开明政治家在社会大变动时期关于调整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关系的积极见解。”孙绿怡认为历史上的晏婴终于成为传说中文学中的主角，是因为“人民把减轻压迫和剥削的希望寄托在这位体恤人民的‘贤相’身上。”

关于本书中晏子这个人物形象，大家一致认为已不完全是历史上晏婴的原型，而是经过了艺术上的加工，“它既继承了《国语》《左传》等书注意历史真实的优点，同时又吸收了民间传说善于夸张想象的长处”（谭家健），“是根据大量不相联缀的历史传说和民间故事进行了艺术上的再创造的”（孙绿怡）。

三 对后代文学的影响

诸子散文对后代文学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以《论》、《孟》为代表的儒家和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的影响。

对前者，大家比较一致地肯定了其仁政学说的积极意义。张式铭《论孔子、儒家，及其对中国古代作家作品的影响》（《湘潭大学学报》79·1—2合刊）认为其积极影响主要体现在民本思想、大一统思想及大同思想、道德规范上。校枫《儒家的仁政学说与古代文学》（《北京师院学报》79·1）说“仁政学说是封建时代地主阶级作家现实主义创作的指导思想之一”，仁政学说“激发作家关心和反映民生疾

苦”、“抨击暴君暴政”。有同志还分析了孟子的“气”论对后代作家作品的积极影响。

对于儒家的消极影响，陈祥耀《孔子的历史作用及其对后代文学的影响》（《福建师大学报》79.3）指出，由于儒家把“许多歌唱男女爱情的郑国的‘风诗’贬为‘淫’诗，这就形成后代儒家贬低描写爱情的文学作品的偏向”，提倡温柔敦厚“就不利于真正表‘怨’文学的发展”，“过分强调文学的经世致用，影响后代一些儒者形成狭隘的文学观念”。

庄子对后代的影响极为复杂，比较通行的看法是庄子“在思想上主要是消极影响，在文学发展上主要是积极影响。”（陆永品：《〈庄子〉散文研究管见》，《文学遗产》81.1）因此有人主张“要把哲学上的庄子和文学上的庄子适当区别开来。”（张志岳：《文学上的庄子》）对此，杨成福《关于文学上的庄子之评价问题》表示异议，认为“不是‘哲学上的庄子’用相对主义等干扰‘文学上的庄子’，而是二者本是一个人。”

有的文章专题讨论了李白、苏轼等人所受庄子思想和文学的影响。陆永品《〈庄子〉散文研究管见》还研究了辛弃疾所受庄子的影响，认为辛虽从庄那里吸取过有益的东西，但辛受庄的消极影响更大。曹础基《庄子的艺术评价》，（《华南师院学报》79.3）探讨了毛泽东诗词受庄子影响的痕迹。文章说毛泽东诗词中许多典故出自庄周，“至于毛泽东同志的诗词富于想象、善用夸张，也是对《庄子》有所借鉴的”。

多数同志认为，儒道对后代的影响是很复杂的，往往又是相互交融的，在贾谊、司马迁、陶潜、韩愈、柳宗元、苏轼、王安石乃至汤显祖、曹雪芹、鲁迅、郭沫若等人身上，总是同时可看到儒道两家思想的影响的，而同时又各自带上

鲜明的时代特点和个性特点。

此外，后代特别是明清一代不少文人学者采用选批、评点等方式对先秦诸子散文的思想艺术成就进行研究，其方式虽然过于琐碎，且常有故弄玄虚、言过其实之处，但其中实有精彩的见解，这将有助于我们对诸子散文的理解和艺术欣赏。陆永品在《庄子散文的笔法——明清〈庄子〉散文研究论略之一》（《文学遗产》83·2）和《明清学者对庄子散文艺术性的研究》（《光明日报》1983.10.18）二文中从四个方法总结了明清学者对《庄子》散文艺术性的研究：“（一）以大笔起，以大笔收；（二）抑扬开合，变化无穷；（三）设喻之妙，沁入至微”和庄子散文“喜笑怒骂，皆成文章”的讽刺艺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对后人特别是明清学者的这部分研究成果重视还是不够的，常见人引用他们的某些论述，但缺少系统的研究。

从以上粗略的概述来看，建国以来我国学者对诸子散文的研究成绩是很大的。但我们觉得有些问题还可作更深入的探讨，有些问题还未引起我们注意。概括起来说是否体现在这几个方面：先秦诸子散文和先秦其他文学艺术样式（主要是诗歌、美术、音乐、舞蹈、工艺、建筑艺术）之间的关系；诸子散文和史传散文的关系；诸子间相生相灭、相反相成、互相融合吸引的关系；除上述诸家外，和其他诸子如《孙子》、《管子》等散文亦即整个先秦诸子“散文总体”的关系；诸子文学创作和他们的文学思想的关系。等等。我们想如果把这几个问题结合起来考察，可能会有助于对诸子散文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本文资料截止于1983年底）

选自《文学遗产》1984年4期